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2006 年 11 月，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公佈了「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這是中國大陸首次公開的利用外資規劃，利用外資將呈現新的變化。利用外資促進經濟發展，是中國大陸的基本政策。自 1979 年開始，中國大陸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改善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從各國政府及世界金融組織獲得貸款，另一方面改善本身的投資環境，創造商業機會吸引各國廠商到大陸投資。從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發展的趨勢觀察，1980 年代主要是國際貸款，自 1990 年代初以來，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則逐漸占大多數。¹

近年來，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政策態度，正在從「來者不拒」向「擇善而從」轉變，也就是從「招商引資」轉向「招商選資」。2006 年 11 月，中共發佈「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這是中國大陸首次對外發布利用外資五年計畫，是今後幾年指導中國大陸利用外資重要的政策。中國大陸宣示將持續推動利用外資從「量」到「質」的根本轉變，使利用外資的重點從彌補資金、外匯缺口等考量，切實轉到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上，更加注重環境保護、資源能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效率。爲了落實「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所宣示的政策方針，中國大陸已著手完成修訂現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並加速研擬「外資併購限制實施細則」。自 2006 年以來，中國大陸已先後頒佈實施多項政策措施，譬如 2006 年 9 月修訂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2007 年 7 月公告的「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2007 年 10 月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

¹ 高長，「中國吸引外資政策已出現重大變化」，全球台商 e 焦點，第 90 期，2007 年 11 月，<http://twbusiness.nat.gov.tw/epaper/y07/11/91-102.htm>。

導目錄（2007年修定）」和2008年開始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即在2008年8月施行的「反壟斷法」等。

中國大陸屬於開發中國家，根據學者江小涓研究顯示，中國大陸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能彌補經濟發展中的各項缺口，對經濟發展的實際影響表現在資本形成、對外貿易、技術轉移、就業效應與制度創新等各方面，也就是利用外資可以加速國內資本形成，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技術和產業結構升級，提高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增加國內就業和財政收入，並且推動了中國大陸市場經濟改革。²不過，外商直接投資不完全是正面的影響，在2001年年底，中國大陸正式加入WTO後，按照入會有關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承諾，進一步放寬外資對中國大陸市場的進入限制，直接加速了外商在大陸的投資，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在對中國大陸經濟發生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免給經濟發展帶來某些負面的影響，例如，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擴大了產業結構偏差、削弱了企業自主進行技術開發的能力，或者是某些淘汰產業和污染行業的進入，對環境保護和經濟持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³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其經濟成長有目共睹，加入WTO後，外商直接投資加速流入中國，2003年中國就已成爲全球吸引外資第二位。然而每年皆高達10%以上的速度再成長，卻造成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過熱，所以中國大陸民間卻有所謂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諷語，這是反映中國大陸的市場機能未建立完善。⁴在投資者首重生產環境的穩定與基礎建設的完善之考量下，而中國大陸在基礎投資環境和相關法規都有相當程度不足，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問題日益突顯是可想而知的事，也因此，不論中國大陸的外資政策或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已在中國大陸內部引起很大的討論與爭議。在進入「十一五」時期，中國大陸政府針對外商直接投資過去所帶來的影響與問題在政

² 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02年），頁25-86。

³ 馬凱主編，**十一五規劃戰略研究**（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頁6。

⁴ 陳添枝，「中國經濟成的得與失」，**經濟前瞻**，第100期（2005年7月），頁32。

策方面做出重大調整，中國大陸經濟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需求也將逐漸發生變化，這意味著中國大陸利用外資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是我國台商在投資中國大陸所應該關注的。而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為何？對中國大陸帶來的效應為何？值得深思探討，故引起本研究的動機；外商直接投資投資中國大陸為其經濟發展帶來正面影響，同時也伴隨諸多負面效應，中國大陸當局也亟思面對此一結構上的衝突，逐步調整吸引外資的作法，此為本研究的另一動機。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救命仙丹，抑或為中國大陸經濟的糖衣毒藥，亦為本研究核心之研究動機。

二、 研究目的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在外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持續增長、中國大陸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快速是必然的結果。儘管如此，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持續發展也引起中國大陸各界若干負面的議論，自 1979 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帶來的效應及產生的問題，正是啟發本研究所欲討論之課題，因此本論文主要探討如下列四點：

- (一) 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必要性。
- (二) 透過分析中國大陸各時期外資政策的形成背景，探討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調整軌跡與深層問題。
- (三) 從各時期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的資本、貿易、技術、制度和就業等影響，剖析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帶來的正負效應。
- (四) 探討「十一五」時期外資政策之調整，藉以找出中國大陸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階段所遇到的問題。

第二節 理論與文獻探討

一、概念與理論

(一)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的結構

一般來說，資本在國際間移動的「資本」主要有兩種，其一為外人金融投資(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此為外國的基金到地主國購買股票或有價證券，但沒有參與企業的經營；其二是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即外國人到地主國(host country)設廠投資，且擁有經營權或參與權。⁵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是以國際貿易理論之比較原則為主要依據，二則是以產業組織為根據。⁶但若以單一層面或幾個因素來說明對外投資活動，都不免失之偏頗，因此學者鄧寧(John H. Dunning)針對上述兩類理論加以調和，提出了「折衷理論」來解釋對外投資的決策。

折衷理論 (Eclectic Theory)。是英國學者鄧寧(John H. Dunning)針對跨國生產或海外投資提出一個一般性的解釋，它綜合海默 (Stephen Hymer) 在 1960 年提出的壟斷優勢論 (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弗農 (Raymond Vernon) 1966 年提出的產品循環理論 (Product Cycle Theory) 和貝克里 (William Buckley) 和卡森 (Carl Casson) 於 1976 年一起提出的內部化理論 (Internalization Theory)，整合成為單一理論，也稱為所有權－區位－內部化典範(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 OLI)。⁷他結合了國際貿易和國外生產的觀點，解釋了國際經濟的技術轉移、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決策行為。

鄧寧(1979)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行為取決於以下要素：第一是「所有權優勢」(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所有權優勢是企業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它是指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的、東道國國內企業所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

⁵ 謝登隆主編，**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台北：智勝文化出版，2006 年)，頁 205。

⁶ 吳清松，**國際企業管理：理論與實務** (台北：智勝文化出版社，1999 年)，頁 64。

⁷ 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台北：雙葉書廊出版，2005 年)，頁 322。

及其所有權，這類優勢主要是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包括技術優勢、管理能力、商標等等；第二是「區位優勢」(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它是指企業在投資區位上具有的專屬優勢，例如勞力成本較低廉、被投資國的優惠政策等；第三是「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specific advantage)，它是指企業在內部轉移資金、技術、管理技巧和其他所有權優勢，以減少外部交易成本的能力，避免把不完全市場所帶來的影響，讓企業的優勢保持在企業的內部。⁸

假使企業若只擁有第一項的所有權優勢，會選擇合資或策略聯盟比較有利；而企業擁有第一項和第三項優勢，卻沒有第二項的區位優勢，則會偏好以直接出口的方式來獲取利益；因此，當只有企業同時擁有上述三項優勢的情況下，直接對外投資的行為才會形成。換言之，企業所擁有優勢必須與當地地區的優勢結合才能獲得所期待的利益，而且必須透過內部化的方式來呈現，避免過高的交易成本，以創造最大的利潤。因此鄧寧的折衷理論可說是對外投資決策過程的基礎。雖然折衷理論可以作為討論外商直接投資何以發生的起點，但有兩項缺點。包括未能妥善交代對外投資與貿易的關連，以及由於太過一般化以致無法實際驗證，這不能不說是該理論的缺陷，例如無法解釋何以自 1980 年代以來，全球跨國投資大量增加的現象。⁹

所以 鄧寧在 1993 年發表了新的觀點。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整合分為六種類型：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效率導向型、策略資產導向型、貿易流通型、支援服務型，不同類型的動機就有不同的策略目標；他認為早在六、七十年代時，一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動機皆以獲取資源、開拓市場為主，但八、九十年代以後，跨國公司興起，對外投資只有在當地可以提高更高利潤的條件下，跨國公司才有可能在開發中國家投資，只有在有希望獲得長期高額收益的條件下，它們才有可能進行技術革新、培訓和提高國內資源利用率等方面的工作。¹⁰因此，

⁸ 林彩梅，**多國籍企業理論**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6 年)，頁 56~58。

⁹ 江啓臣等著，**全球布局投資策略與 FTA 投資關聯之探討** (台北：經濟投資審議委員會，2006 年)，頁 13。

¹⁰ 鄧寧，「重估外國直接投資的利益」，**管理世界雙周刊**，第 1 期 (1994 年 1 月)，頁 161~163。

現在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不再是以某定點、單一市場為目標，而是以全球戰略的觀點為出發點，以投資效率的衡量為主，並以投資策略和行銷策略為輔，以期獲得最大利潤，也只有在此前提下，在跨國企業投資的過程中，才有可能為東道國進行技術革新、培訓人才等工作，而使得東道國在經濟發展上有所提升。

（二） 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

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言，如何利用國際的資金和技術來達成本國經濟持續的發展，是政府是否引進外資的重要目的；若要追求經濟的發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是必要的，此部份可以由以下的理論來討論。

1. **雙缺口理論 (Two Gap Model)** 是由錢里納(H. Chenery) 和 斯特勞特(A. N. Strout) 綜合由巴薩拉(B. Ballassa) 與麥金農(R. Mckinnon) 等人所提出的外匯缺口理論 (foreign-exchange gap theory) 和由 羅森斯坦－羅丹(D. N. Rosenstein-Rodan) 提出的儲蓄缺口理論 (savings gap theory) 而發展出來的理論。¹¹在這兩個理論的研究基礎上，將引進外資與投資、儲蓄和進出口聯繫起來，全面地論述了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錢里納和斯特勞特(1966)認為，開發中國家要實現均衡的經濟發展，必須累積足夠的資本。在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儲蓄、投資、進口、出口等，這四個因素相互作用；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國內儲蓄往往不足以支援投資的擴大，影響了經濟發展，即所謂的儲蓄約束；發展中國家又面臨出口收入小於進口支出的困境，有限的外匯不足以支付經濟發展需要的資本財所造成的外匯缺口，稱之為外匯約束，而投資約束與外匯約束構成了雙缺口模型的理論基礎。¹²

利用均衡方法進行分析，儲蓄約束和外匯約束在量上相等，用總體公式表示為：

¹¹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 (2001 年 3 月)，頁 19。

¹² 譚崇台主編，**發展經濟學**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3 年)，頁 452~453。

$$Y = C + I + X - M$$

Y是國民所得，C是消費，I是投資，X是出口，M是進口，S是儲蓄，將上式換項後變為：

$$Y - C = I + X - M$$

因為國民所得恆等式為：

$$Y = C + S$$

代入上式得：

$$S = I + X - M$$

調整得：

$$I - S = M - X$$

上式($I - S$)是投資與儲蓄之差，稱為「儲蓄缺口」，($M - X$)是進口和出口之差，稱之為「外匯缺口」，從均衡的觀點來看，左、右兩式必須相等，若表示出國內出現儲蓄缺口即投資大於儲蓄，則必須用外匯缺口即進口大於出口來平衡。通常發展中國家的這兩個缺口並不相等，不是遇到國內儲蓄的短缺，就是遇到出口所需的外匯短缺，因而需要來自於外部的資源來填補這兩個缺口以實現平衡。¹³

所以，發展中國家有效利用外資減少儲蓄缺口，可以減輕貿易缺口所形成外匯缺口，改善國際收支。利用外資來平衡這兩個缺口，既能解決國內資金不足問題，又能減輕外匯不足的壓力，從而滿足國內經濟增長對投資和進口的需求，這就是雙缺口理論的基本思維。¹⁴理論認為當發展中國家為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而需要的資本數量（主要是儲蓄和外匯）與國內最大有效供給數量之間存在著缺口時，引進外資對於彌補這些缺口是必要的，並說明在經濟發展中政府政策調整的重要性。雙缺口模型對於解釋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現實必要性與理論動機是非

¹³ 同上註，頁 453。

¹⁴ 劉祥熹、王麗惠，「兩岸外人直接投資主要來源國資金互動關係與產業結構衝擊影響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80。

常有說服力的，至今仍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引用外資的政策上，仍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中國大陸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雙缺口模型價值雖然是不言而喻的，但理論的分析也有不足之處：¹⁵

(1) 它的分析方法是總量分析，雖然可以說明需要從國外引進的資源數量，但由於缺乏對國外資源結構的具體分析，因此無法確定引進外資的具體類型及其數量。

(2) 它過分強調了引進外資的作用，而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發掘國內資源彌補兩缺口的潛在能力。

(3) 它過分強調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而未分析更為重要的技術約束或吸收能力約束。事實上，發展中國家最缺乏的是技術知識、管理和企業家的才能。因此，必須在引進外資時，注重對國外的適宜技術、管理知識和人才等軟件的配套引進。

(4) 它只強調了利用外資的積極作用，而忽視了外資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5) 它認為儲蓄缺口、技術缺口對經濟發展是階段性的，可是在現實上這些缺口往往是同時存在的。

不過總體來說，兩缺口理論對於分析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仍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質意義。

2、其他缺口理論，雙缺口理論指出了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資本往往不足的困境，因此如何填補缺口成爲各國政府在經濟政策調整的重要目標，然而在利用外資來加速經濟發展投資的同時，也要進行技術的革新，所以托達羅 (M. P. Todaro) 將其擴張爲「四缺口」模型。托達羅認為利用外資來加速經濟發展，不僅可以消除儲蓄和外匯缺口，還可以彌補的第三缺口是政府現有的稅收計畫目標與實際徵收到的稅款之間的「稅收缺口」(tax revenue gap)，以及

¹⁵譚崇台主編，**發展經濟學**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3年)，頁456~457。

第四個缺口在技術、管理、企業經營和技能以及資訊等方面存在的「技術管理缺口」(management gap)，加上儲蓄與外匯缺口，就是所謂的「四缺口」模型，他相信外國企業的經營能夠部分地或全部地彌補這方面的缺口。¹⁶

根據上述的論點，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以對跨國企業在當地的經營活動徵稅，透過徵稅等形式，為政府籌措稅賦，來填補稅收缺口，以支持政府在發展經濟所需的資金，而且跨國企業在當地設廠投資，能夠提供包括企業經營、管理經驗、教育訓練和生產技術等必要技能，因此在利用外資的同時，注意對國外的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的引進，使的國外的資源可以充分利用，便可以有效地彌補技術管理缺口，進而達成經濟發展的目的。

事實上，利用外資有利也有弊，發展中國家既有成功利用外資的事例，如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曾經利用外資成功地幫助實現了經濟起飛，有的已步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但也有利用外資不成功的例子，如拉美的一些國家曾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之中，所以衍生出依賴理論。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亦顯示出，東亞一些國家在利用外資上存在的問題，例如外資企業因受到貨幣貶值的影響投資資產縮水，損失慘重，紛紛撤資，使經濟成長大幅減緩。¹⁷

(三) 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效應影響

正如上述的折衷理論所述，從外商直接投資的動機來看，以往著重尋求當地市場和天然資源的水平式對外投資，逐漸轉變成追求更低生產成本的垂直式對外投資；而從缺口理論所述，開發中國家願意引進外國的直接投資，是因為外商直接投資能彌補在經濟發展中的資本缺口，外商直接投資除了增加投資量之外，還幫開發中國家帶來生產技術、管理技能和競爭力。總體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效應反映在各個經濟層面上，大體可以歸納出下列幾種：

¹⁶ Michael P. Todaro 著；黃衛平譯，**經濟發展**，第六版（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頁584。

¹⁷ 王鶴松，「金融風暴對東協四國台商的衝擊與政府應有的對策」，**國策期刊**，第2期（1998年3月），頁17。

1、資本效應：開發中國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來幫助彌補在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舒緩經濟成長中的約束，加速經濟發展。

2、貿易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貿易效應，取決於進口替代、出口創造和進口引發的綜合作用。一般來說，尋求低成本動機的外商直接投資有利於東道國出口，尋求市場動機的外商直接投資則有利於擴大東道主國的生產能力，滿足國內需求，與同類國產和進口產品形成競爭，從而減少進口，但不論是哪一種外商直接投資，只要它們在生產過程中依賴國外生產設備或原材料，就會增加東道國對這些生產設備或原料。¹⁸因此利用外資的引進，可以解決進口大於出口所照成的國際收支逆差的問題，並且帶動出口的增長，解決外匯的不足。

3、技術效應：外商直接投資的出現，會給東道國企業帶來示範與模仿的作用，促進當地廠商技術效率和產品質量的提高，使得國內的技術能夠創新，創造國內生產所需的技術。對於技術外溢的現象有幾個特點：第一，技術的接受者和創始者的技術能力越是密切相關，接受者的能力越強，則成本就越低；第二，企業是否能夠在相關領域開發有用且互補性的技術，即成為企業技術接受能力的衡量標準；第三，技術的外溢主要發生在相關領域中的企業之間，企業技術水準決定了企業獲得現實的技術外溢機會和發現潛在技術外溢的能力。¹⁹基於以上三點分析可得知，東道國是否能順利接收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技術外溢，其本國企業的技術能力，也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4、就業效應：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都在追求更低的生產成本，因此投資往往會比較偏向勞力密集型產業，尤其是製造業，所以不但擴大了東道國的就業率，也提升人力素質，並且增加國民所得。

5、制度效應：透過國外的直接投資，對於東道國的政經制度具有程度上的影響。在其經濟體制的轉型，法律配套制度的建立和管理制度的引進等等，尤其是市場制度的引進，刺激轉型的國家國內市場的發育和市場機制的運作最為普

¹⁸ 朱廷珺，**外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42~45。

¹⁹ 楊先明等著，**國際直接投資、技術轉移與中國技術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38。

遍。²⁰經由市場機制的建立，發展自由貿易，透過外資企業的發展，促進國內生產的專業化，形成規模經濟，並引進新管理制度提高社會的獲利能力，促進東道國的經濟成長。

無論FDI採取何種方式進入東道國，對東道國的經濟發展都會產生許多影響，特別是在擴大投資、促進出口、創造就業、開拓國際市場、轉移現代技術和管理經驗、開發人力資本、發展關聯產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以及經濟長期穩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²¹當然，上述的效應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能需要配合的其他條件，例如適當的外資政策和產業政策、東道國本身的吸收能力等等，才能充分發揮FDI的效益，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

從上述整理發現，折衷理論和雙缺口理論可以說明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必要性與外資政策的選擇與執行；正因外商直接投資以期在東道國獲得最大利潤，也只有在此前提下，在跨國企業才有可能為東道國進行投資，加上中國大陸在發展初期，期待透過外商直接投資來擴大對外貿易規模和增加生產要素流動，所以中共在制定外資政策時勢必須要給予外商企業許多優惠政策與環境，以吸引外商投資來彌補在發展過程中會產生資金與外匯兩個缺口。但正如上述雙缺口的缺點，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所說明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特性，隨著時間的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負效應日益明顯，使的在外資政策的選擇須進行調整，而四缺口理論延伸至「稅收缺口」和「技術管理缺口」，正好在政策調整上提供理論的依據。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資是既定政策，給予外資企業優惠是吸引投資的手段，目的是達到經濟發展，但隨著發展過程中需求的不同，在外資政策調整上要如何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一直是中國大陸所追求的。因此，從上述的理論可以將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發展之關係與其產生的效應做一分析與印

²⁰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 (2001 年 3 月)，頁 21。

²¹ **Dominick Salvatore** 著；陳婉玲譯，**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國與國之間的選擇** (台北：台灣西書，2006 年)，頁 154。

證。

二、文獻回顧

首先整理學術界對於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研究文獻，將此議題研究成果文獻做綜合性的整述。從現有成果看，外商直接投資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主題上：

1、中國大陸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必要性

魏艾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一書中，從中國大陸外資體制的演變和外資運用的發展，指出由於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因為本身缺乏資金、技術不足，加上自身企業經營技術與體質落後，因此中共當局迫切希望能夠借助外資來改善經濟發展上的困境，而利用外資引導自身的經濟成長，也成為 90 年代以後，中共當局推動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主要策略之一，所以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大陸各級政府無不積極的招商引資，希望藉此能帶增進地方的經濟發展，此舉也使的中國大陸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外資接受國。²²

林毅夫於「中國經濟：透析全球最大經濟體，掌握大陸市場經營契機」一書中，指出在中國使用外資的總額中，外商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外商直接投的主要特徵，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國大陸引進外資的特徵，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引進外資是經濟發展過程的結果，因而引進外資狀況應該能夠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與比較優勢的關係；另一方面，對於資本輸出國而言，對外投資是為了與他國互補的比較優勢，已取得更高的資本收益，並打盡其他國家的國內市場。²³作者認為與這兩種資本流動的特性相配合，中國大陸引進外資的情況，具有以下特

²² 魏艾等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132~135。

²³ 林毅夫、蔡昉，**中國經濟：透析全球最大經濟體，掌握大陸市場經營契機**（台北：麥格羅·希爾出版社，2003 年），頁 289~298。

徵：(1) 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大部分來自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2) 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地區比較集中。(3) 外商直接投資集中在製造業。綜上所述，中國大陸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格局特徵，與中國大陸得比較優勢現狀、地區發展水平、投資環境、外資政策和部門保護等因素相關，隨著加入 WTO 後更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上述的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方向也會逐漸轉變。

2、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效應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戰略問題意義重大，因為它關係到中國大陸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當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持續發展的同時，檢視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效應是必要的，因此它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

趙晉平在「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 1980 年代以來，特別是隨著 1990 年代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具有資本形成效應、技術外溢效應、產業升級效應、貿易創造效應、就業效應的觀點，因此引進外資對於一國的經濟發展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甚至成為經濟起飛和持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而中國大陸自 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積極利用外資，發展對外貿易，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因此作者以實證分析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關係，整理出下列幾項：(1)外商直接投資是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重要資金來源，成為資本累積的主要來源；(2)外商直接投資的迅速擴張促進了中國大陸的工業，升級促進產業結構優化；(3)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是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帶動因素，並提高創匯能力；(4)利用外資對中國大陸技術進步的促進效果作用明顯；(5)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大陸不可缺少的稅收來源；(6)利用外資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7)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完善發揮了重要作用。²⁴

陳永生在「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論著中，以中國大陸為例，

²⁴ 趙晉平，**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9。

檢視其外國的直接投資與其經濟發展的關係。其認為中國大陸自從一九七八年進行改革開放後，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腳色，中國大陸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是爲了達到追求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利用外資填補其資本、技術、管理、稅收等缺口有其必要性；而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大陸的主要意圖，不外是爭取資源、市場，甚至是爲了其全球化的目標作資源的配置，已達其經濟效益，因此雙方各期所需，達到預定的目標，但利用外資並非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還必須加上其他因素（如產業政策、外資政策等）的配合，才能對東道國產生助益。²⁵作者研究外資對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表現在資本累積、進出口貿易、就業率的提高及制度示範效果等方面，皆有著正面的貢獻，但在技術轉移方面則仍有待加強，不過就中國大陸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目的而言，不管是資本的需求、平衡國際收支、技術進步等方面的效益都是肯定的。其結論認爲，中國大陸的利用外資政策將不再是無條件的接受外商直接投資，而是從內外有別到平等競爭，提供優惠到規範管理，未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將成爲投資新焦點，爲平衡東西的發展差距，鼓勵外資投資中西的政策也將繼續推動。總體來說，過去二十多年來，大陸的外資政策是配合其經濟發展目標而制定調整的，其政策效果值得肯定。

江小涓於「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一書中，以計量分析來評述中國大陸的外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影響，分析外資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發現外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展現在對國內生產毛額 (GDP) 的增長、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出口和提昇出口商品結構、增強研究與發展能力的貢獻等許多重要的方面。作者認爲自 20 世紀的 70 年代末期開始吸引外資，至 21 世紀初期，外資經濟在中國大陸經濟中已佔據重要地位，特別是加入 WTO 後，外資經濟不僅推動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成長，也改變著經濟成長的方式，一方面也提高經濟成長的質量，外資不僅是重要的資金來源，還可

²⁵ 陳永生，「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 (2001 年 3 月)，頁 17~43。

以改善投資效益、擴大產出、引進先進技術、提升產業結構、擴大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增加稅收、技術研發活動以及體制改革，不過利用外資的利弊也引起很大的爭論，且爭論在 1990 年代後期有增加的趨勢，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利用外資會壟斷市場、外部衝擊、技術依賴性、貿易摩擦、國家經濟安全及必要性減弱等方面。過去以往中國大陸資金缺口大，因此要利用外資來補足缺口，但現在中國大陸資金供應較充裕，生產能力大量過剩，因此沒有必要繼續大量引進外資，但繼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仍然有重要意義。²⁶

3、中國大陸未來外資政策調整方向

胡景巖在「加入 WTO 後中國外資政策調整」一文中，提到入 WTO 後，中國大陸市場開放更進一步擴大，吸收外資政策須更加符合國際要求，中國吸收外資進入新的階段，他提出政府今後的外資政策方向：(1)改善外商投資相關法律法規，保持外資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2)建立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3)更進一步開放市場，特別是服務業；(4)加強對外商投資的產業引導，處近產業升級；(5)探索新的投資方式，拓展外商投資的領域。²⁷

裴長洪在「論中國進入利用外資新階段：「十一五」時期利用外資的戰略思考」論著中，指出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特別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已經達到了當初最主要的既定目標，從未來趨勢看，雖然利用外資仍然具有推動經濟成長的作用，但隨著國際投資方向和結構的變化，以及中國大陸境內經濟主要問題的變化，利用外資的其他作用和功能將逐漸成長，中國大陸經濟對利用外資的需求也將逐漸發生改變，這意味著中國大陸利用外資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作者認為從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的經驗看，利用外資得當，必然有助於東道國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對於「十一五」時期利用外資他提出幾點建議：

²⁶ 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02 年），頁 2-22。

²⁷ 胡景巖，「加入 WTO 後中國外資政策調整」，**WTO 經濟導刊**，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70~74。

(1) 完善產業進入政策；(2) 產業標準化管理應修訂法規來監督；(3) 外商投資優惠政策應該改變新的政策目標；(4) 繼續擴大開放，打破一些產業的壟斷；(5) 繼續加強改革，為新興產業創造市場需求；(6) 發展國家技術開發投資，加強與外資研發機構的合作。中國大陸未來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仍將發生很大的作用，能否在這個過程中把外資利用與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方式轉換的新任務很好結合起來，和加快中國大陸經濟結構的調整步伐，是利用外資新階段所面臨的重要課題。²⁸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成果，學者們對於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在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做出相當大的貢獻，皆抱持正面的看法，但加入 WTO 後，目前的外資優惠政策已經不符合中國大陸當前經濟社發展的需要，中國大陸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產生諸多的負效應，成為學者們討論的焦點。中國大陸利用外資政策，涉及了「國民待遇」和「超國民待遇」的選擇、外資規模的控管、稅率的制定、優惠的多寡、開放地區的大小、投資領域的限制和法律的規範等等，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正負效應的調控，應取決於外資政策的調整與執行，已使負面的效應減至最低，而如何因應，則是「十一五」時期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新戰略目標。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帶來的效應來分析，觀察中國大陸各時期的外資政策發展演變與「十一五」時期外資政策調整原因，探討其因果關係，並展望未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新方向。

²⁸ 斐長洪，「論中國進入利用外資新階段：“十一五”時期利用外資的戰略思考」，*中國工業經濟*，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4~22。

第三節 研究假設與範圍

一、 研究假設

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首次對外發布利用外資五年計畫「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這是今後幾年指導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重要文件。在文獻探討發現中國大陸在「十一五」時期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新戰略目標，從以往的彌補資金、外匯不足轉換至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中國大陸利用外資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因此本論文假設外商直接投資投資中國大陸過程中，在資金與外匯、進出口貿易、科技技術、管理制度和就業等方面提供經濟發展的需求，並假設的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是必然的，各時期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調整是爲了減少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負效應，並使外商直接投資更加有效利用以滿足其在經濟發展過程的需求，外商直接投資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彼此之間的關係來探討其影響



二、研究範圍

在 1979 年以前，中國大陸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以「封閉索國、自給自足」的原則，引進外資微乎其微，直到 1978 年 12 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確定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至今，外資大量湧入，其中又以外商直接投資爲主，因此，本論文檢視外商直接投資自 1979 年至 2007 年，在各時期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關係演變作爲研究範圍，試以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資金與外匯、進出口貿易、科技技術、管理制度所帶來的效應與中國大陸的外資政策之間的關聯，來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影響。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論文以外商直接投資做為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為分析主體，並會透過資金與外匯、進出口貿易、科技技術、管理制度來影響經濟發展，因此本文分析重點以外商直接投資在各時期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的關係，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資金與外匯、進出口貿易、科技技術、管理制度和就業效益所產生的效應，試圖解讀中國大陸在各時期外資政策調整成因與發展方向，以找出中國大陸在「十一五」時期利用外資的轉變因素，並透過相關數據的分析與理論的結合，來驗證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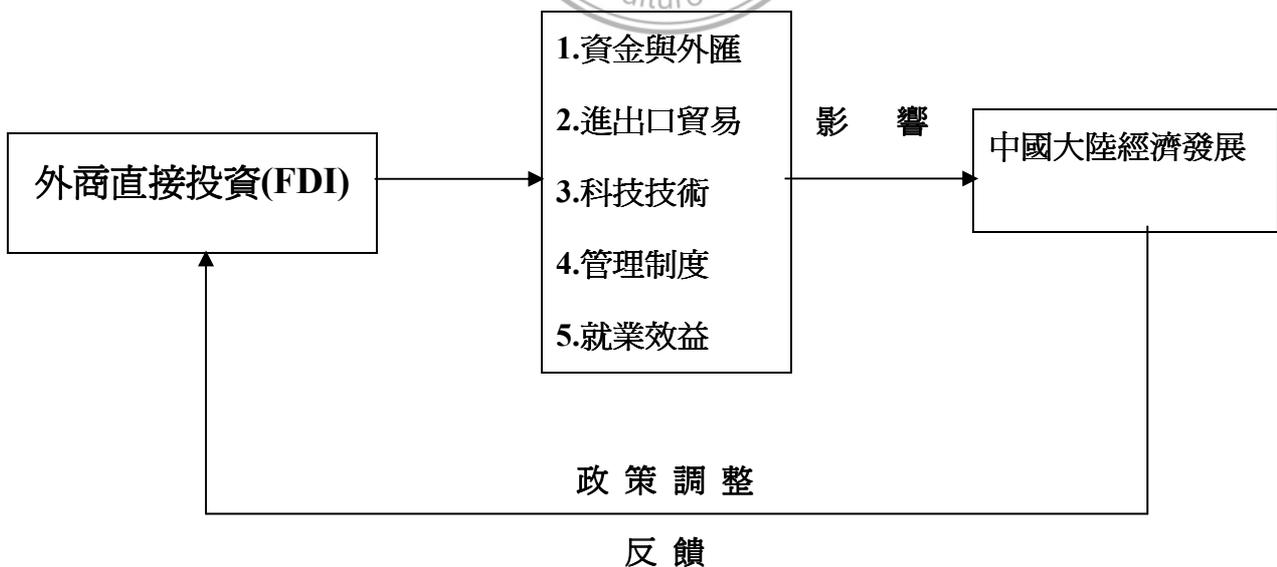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方法

(一) 歷史分析法

歷史分析法包含著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及其他科學家對歷史方法的使用。歷史分析法是事務通過時間連續而構成的變化過程，歷史研究是從歷史資料中發現可供研究的題材，並分析解釋已發生的現象，進而瞭解過去、現在與預測未來的方向。²⁹本論文採用歷史分析法，意圖瞭解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發展的脈絡來加以分析，以利於找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影響與各時期外資政策調整之因果關係。

(二) 文獻分析法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蒐集資料是爲了驗證問題獲解決問題，但必須採用適當的方法加以分析，已使原始資料成爲分類化、系統化、及簡要化的結果。³⁰經由各種途徑，廣泛收集各種文獻資料，並予以整理分析與歸納。本論文所收集的文獻包括中國大陸歷年重要的外資政策與外資在中國大陸各項的統計數據，以及國內外專家發表之相關文章與著作和相關論文，作爲本論文的主要文獻依據與參考素材，試圖從中歸納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產生的效應，來分析各時期外資政策調整的意涵。

²⁹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李明寰、李承宇等譯，**社會科學研究**（台北：時英出版社，2004 年），頁 493。

³⁰ 楊國樞等編，**社會及行爲科學研究法**，（台北：三民書局，1989 年），頁 6。